

当代文学的 三次浪潮

Dangdai Wenxue De
Sanci Langchao

江 冰◎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文学^的 三次浪潮

Dangdai Wenxue De
Sanci Langchao

江 冰◎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学的三次浪潮/江冰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306 - 05915 - 4

I. ①当… II. ①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767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高惠贞

责任编辑: 刘学谦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李艳清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0.25 印张 4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批评

“文革”时代的小学生、上山下乡的末代知青、恢复高考后的 77 级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辅导员、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讲授当代文学，撰写文学评论。这些“关键词”无疑是我们这一代文学批评者的时代烙印。我们的精神特质带有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风范：质疑、批判、思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纠结，体制规范与个体自由的纠结，相互冲突，缠绕一生。就我而言，文学批评几乎等于人生，虽然有一次短暂分离，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仿佛命中注定，爱它，恨它，我的归宿还是它——我没有按惯例将“它”写成“她”，是因为“文学批评”与我还是庄重、严肃、痛苦、理性的——远远多于轻松、自由、欢乐、感性。在我的人生里，我可能太把它当一回事，以至它越过职业侵入生命，且时而冰冷坚硬，时而火热兴奋。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或许我不会选择“它”。具体到我的文学批评历程，恰如书名“三次浪潮”，即是我的三个阶段——

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主题词：新时期。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光荣而辉煌。文学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一篇短篇小说可以掀起一股旋风，一首诗歌可以营造一个热点话题，一台话剧可以鼓动一场社会运动。这样的年代，文学批评是亢奋的、高调的、四面出击的。我在大学 77 级中文系里是小字辈，20 多岁留校，功底尚浅，还无法即刻上阵厮杀，加上很快走上大学讲台，有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个时段，我主要是大量读书，以西方文论、中外作品为主。我做了一个题为“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的专题研究，在《文艺评论》发表了系列论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几篇。另外，我参加了当代文学史和散文史的编写，重点是中短篇小说和杂文。不过，这 20 年，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大起大落的转折时期。大约从 1992 年开始，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并逐步边缘化，我们这些文人同样经受了人生失落。我从大学突围，调到文联杂志社，原本雄心壮志意欲“东山再起”，重整旗鼓，办个好刊物，振兴文学批评。但事与愿违，文化界比大学似乎更颓废更无心文学，我于是离开文学，远走深圳，一去 5 年。



在体制外奋斗，体制外做媒体，可谓“跌宕起伏，人生百态；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二是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主题词：“80后”。我重返大学，回归文学。深知文人之宿命，重新发力，再拾文学批评。3个月的痛苦思索：如何确定研究题目？一天，读中学的女儿从我的书架上下了一排书。她坚决地说：“老爸，我的新书没地方放了，占领你的领地。”我一看，韩寒《三重门》、郭敬明《幻城》、春树《长达半天的欢乐》、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等等，青春读物，“80后”作品。我翻了翻，敏锐地感觉到一些我完全不熟悉的气息——与我熟悉的新时期作家迥异的元素——从精神气质到文字表达。我眼前一亮，似乎抓到了什么，但我深知人到中年，不宜放胆随意涉足全新领域。征求文友意见，犹豫彷徨多日。最终决定选择“80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出于对新一代的信心，出于对15年前读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阅读兴奋，也出于对原有经验与新事物碰撞的新奇“陌生感”之价值的确认，我又大量阅读“80后”作品，很快又在15年后再次登陆《文艺评论》。“80后”文学系列论文反响不小，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7年《新华文摘》大篇幅转载，2008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09年再次获得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成立了研究中心，组建我的“80后”研究团队。这个阶段，这次浪潮，成果颇丰，应该是我文学批评生涯的收获季，这些成果影响了社会，影响了一群人。

三是2010年以后。主题词：“本土化”。我一面为“80后”文学批评和研究收尾出书，一面开始涉及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学。1995年，我曾加入“赣文化”讨论，旧情复燃，转而针对广东地域文化弱势，广东文学缺少地域特征、缺少新世纪地标新作品，以及“以北方标准写作”的习惯提出异议。开始撰文，逐步明确写作目标——振兴广东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本土化写作”。我开始写随笔，文学与文化在“本土化”的旗帜下相互交叉乃至不分你我。这个阶段，学术论文不多，多以专栏文章形式见于《广州文艺》《广州人，广州事》专栏、《华声》杂志《广州心情》专栏，以及《羊城晚报》《信息时报》《南方日报》等报刊。文学批评写到这个阶段，自觉开始摆脱所谓大学学术论文的束缚，开始真正表达文学批评者心声，比较自由地阐述一己之见。个性化、感性化的文字，因为微博、微信的碎片化书写，反而渐渐有了如鱼得水的自如与活泼。这同样要感谢对“80后”“90后”青年文化的涉入，我亲身体验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狂欢的气氛——而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时期度过童年、少年的人来说，相当稀罕。我们这一代人与“80后”“90后”的精神反差，恰恰是正反两面镜子：一面照我们，一面照他们。其中的差异，即是学问。不过，我们依旧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本土、故乡、中国、中华。无论互联网如何发展，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大陆人、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都是中国人，都是



炎黄子孙——我们的共同点，我们的相通处，就是传统。所以，可能在第三阶段，我会走得比较久，用心比较多，自我比较多。

三个阶段，三次浪潮。新时期的新特点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批评走向；对“80后”青春写作的研究是我个人对时代的一个探索，也许也是我对当代文学批评具有个人标志性的一个贡献；“本土化”既是生活所在地广州的一个地域召唤，亦是人到中年，回归传统、回归本土的一次文化自觉。我其实也在借此试图找到自己。回首文学批评，几乎就是回首人生。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批评，与人生太贴近、与生命太紧密，庄严有余而个性自由不足，严肃有余而轻松快乐不足。乐乎？悲乎？吾心自知。时光无法倒转，人生无法重来，权当检讨，权当小结，权当一个人生界碑。我还能走多远呢？

不揣浅陋，是为自序。

目录



◎	第一辑 开放时代的新时期文学
002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批判的断想
008	一个模式中的两个原型
015	走向祭坛
022	从自恋到自审：知识者的一次超越
030	历史的阴影
038	悲壮的突围
045	“衣带渐宽终不悔”
052	文体的变迁与杂文的命运
055	价值的失落与寻找
060	小说的正宗
064	文坛两面观
074	新文学人口与新文学群体
079	复活一座城市的记忆
085	坚韧的姿态
093	童话中的精灵与现实中的悲悯
099	草原的神性符号
105	论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
112	网络另类文化：无须回避的存在
116	网络与代沟



◎

第二辑 网络时代的“80后”文学

- 126 “80后”文学的前世今生
- 130 论“80后”文学的“偶像化”写作
- 137 论“80后”文学的“实力派”写作
- 144 论“80后”文学的“另类写作”
- 150 “80后”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 155 论“80后”文学
- 168 “网络一代”的文化趣味
- 170 “80后”文学：“我时代”的青春记忆
- 175 “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
- 183 “80后”：新媒体艺术生成的文化背景
- 189 后青春期：再论“80后”文学
- 200 “80后”文学研究的信心与隐忧
- 204 “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资源
- 210 物质主义的英雄
- 215 在历史与幻境之间
- 222 小说内外的韩寒和郭敬明

◎

第三辑 互动时代的“本土化”文学

- 228 地域文化：纳入人文教育的可能性
- 232 论广东文学的文化差异性
- 237 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一种回应
- 242 恶衣服而致美黼冕
- 248 黎族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
- 255 论赣文化特征的模糊与凸显
- 266 试论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撞击下的黎族文化
- 273 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 281 英雄时代的心灵诉说
- 287 论广东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 295 论广东文学“本土叙述”的苏醒



附录

- 304 添补当代文学史新的空白
306 具有开拓意义的扛鼎之作
308 视野宏阔卓具特色
311 文采与眼界，比广州更广州

313 后记

第一辑

开放时代的新时期文学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批判的断想

——兼谈知识分子题材创作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既然没有自己的经济地位，也就无所谓自主的政治权利可言。于是，依附于统治阶层或其他社会阶层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然而，作为文化的积累者和传播者，他们又时常扮演各个阶层代言人的角色，这在任何一个历史变革、社会动荡时期都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的知识分子往往以两种面目出现：或反叛传统，人心思变；或维护传统，人心思古。倘若将这两种面目视为两极，那么，具体的历史现象不但要比这两极复杂得多，而且往往在两极之间摆动。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上述“两极”的现象，始终未能构成势均力敌的激烈冲突，即使偶有反叛传统的冲击力量出现，也被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所消解。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有赖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力量的推动，这个古老的国度才形成了一股足以撼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冲击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才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列，真正成为历史变革力量的代言人。唯有此刻，真正的“两极现象”出现了，摇旗呐喊、呼唤变革最为卖力的是知识分子；叹世风日下、维护传统最为顽固的也是知识分子。问题还不在于知识分子内部所分化的两大阵营，作为传统文化母胎中孕育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割断的却是无形中存在的脐带。传统有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凡场中物无不磁化。于是，就有了“五四”以来中国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匆匆过客，有了一个个痛苦呻吟的挣扎的魂灵，有了一部部展示心理轨迹的大书。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古代的科技、工业是极为贫弱的，这也导致了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读书人”理解偏狭，所谓“读书人”几乎与文人画了等号，以读四书五经、先贤圣人言为主的读书人。他们的主要出路就是仕途，以知识为身价跻身统治阶级的官僚集团。官运亨通者得意，仕途不进者失意。他们除了以实际行动争取在国家管理中有所作为外，文学也自然地成为一种参与现实的方式。文以载道是参与，抒怀言情也是参与。在中国社会科学其他门类极不发



达的情况下，文学也就成为记录知识分子思想和精神现象的主要载体。毫无疑问，文学在中国思想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思想史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的一个副本。就20世纪来说，我国社会历史的任何一次变革乃至它所引起的全民族思想情感上的任何一种波澜，都既真实又曲折地反映在文学中，而作为归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作家，他们最熟悉的是自己的心灵以及自身经历的生活，所以，知识分子的形象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此类题材的文学创作的演变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摆脱巨大磁场、消除“磁化”的奋斗历史，是他们占有自身从而把握世界的历史，是他们扬弃自身痛苦而蝉蜕的历史，是他们寻求人生目的乃至整个民族、整个人类出路的历史。借文学宣泄情感，参与现实，干预政治，为民立言，进而确认自身、实现自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确立自己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独立地位的方式之一。

鲁迅笔下的“狂人”，郭沫若诗中的“放歌者”，郁达夫化身的“苦闷者”，丁玲心中的莎菲女士，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巴金笔下的高觉新、汪文宣以及蒋光慈笔下的具有“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等等，无一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的真实记录。文化传统磁场力量之巨大，现代思想、现代文明与传统冲突之激烈，自然也就给试图走出传统魔阵与磁场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阻力和痛苦，阻力与痛苦来自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其中又唯以内部世界之痛苦更为剧烈。故此，反映知识分子心灵痛苦的文学作品在新文学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

中国知识分子理想性格的模型可以说在孔子、老子手中就开始设计，此后历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不断营造和历史现实的反复锻冶，业已成形。它是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谐和的。试图对此进行批判，则有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以及相应的现实基础和时代氛围。

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真正实施批判也由此开始。动力源自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于此时的传统心态的“正式转换”，“几千年皇帝专制在政治体制和观念情感上对知识分子主宰地位的消失或消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道路的阻塞，西方文化如潮水般的涌进……给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以从未曾有过的心灵的解放，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图景和道路是从未曾有过的新鲜、多样、朦胧”。^[1]也只有此种心灵的解放，才可能使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焕发出新鲜的活力，从而具备审视自我、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这种自我批判是与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大课题相吻合的，它是剖析和改造国民性格的一项具体工作。我们知道，改造国民性既是鲁迅先生早年弃医从文之初衷，又是他倾注毕生精力之事业。鲁迅先生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国民人格的病态，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改造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鉴于此，鲁迅先生在关注下层人民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知识分子，这不仅体现在对



“孔乙己”等文学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在鲁迅先生对于自身的严厉解剖上。鲁迅曾经有过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的宏愿，可见作为对大变革时代具有深刻体验的思想家的鲁迅对此有过长久的思索。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鲁迅先生的这种自我批判绝非传统式的自我贬抑和忏悔，他在“五四”时期就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历史作用。他曾经明确指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2]此时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自我批判，是在知识分子以民族启蒙为己任，确认了自身价值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启蒙主题与救亡主题的“双重变奏”，似乎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自身批判必须经受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历史过程。

抗日战争的爆发，迅速激化了民族矛盾，救亡顿时成为首要的任务，严酷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民族战争，以及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种种现实“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3]。这是一个需要行动的时代，一个因此而更换了主角的时代——作为“五四”时期革命先锋的知识分子，此时已让位于成为革命主力的工农大众。这一时代变化给知识分子同时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它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将知识分子排斥于工农之外，抑制其社会地位的倾向。尽管后一倾向在当时还未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此种历史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存的现象较为明显。历史现象的消极面实际上付出了两种代价：其一是对传播和创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贬抑与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思想的贬抑和否定，这实际上又是中国农民式的小生产者狭隘意识对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拒斥；其二是它通过各种外力迫使刚刚开始试图挣脱传统文化束缚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走向“奴化”心理的怪圈，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完善，从而失去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成为匍匐于“神”面前的世俗罪人，从以启蒙为历史使命转变为以接受改造为唯一使命。鲁迅等人手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批判也由此变质为具有封建专制传统色彩的自我否定。

更为不幸的是，消极的历史因素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愈演愈烈，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试图淹没中国思想界的“左”倾思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到对胡佩文艺思想的定性定罪，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打击，中国知识分子完全被放置到接受改造的地位。阶级成分的划法甚至给这一阶层的人们带来了普遍的“原罪感”，严重地影响了几代知识



分子的心态。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中这样写道：“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4]看似轻松的口吻却道出了何等严酷的史实：从“反右”始，无形的“紧箍咒”便成了主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神，痛苦不应全部归咎于政治运动等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大的痛苦来自于知识分子内心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而矛盾心态的根源在于一种“自我审判”，此种“自我审判在‘文革’初期被迅速推向自我作践的残酷地步：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5]人的自我就是这样丧失殆尽，导致宗教“原罪感”的出现。巴金老人的精神状态其实正是当时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状态。处于此种精神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无力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批判。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批判是以肯定知识分子自身价值为前提的，《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基本命题才是它的价值标准。

我们还是将话题回到文学。

应当消除一种误解，即以为自“抗战”之后，由于革命主角的更换，由于对文艺为人民大众乃至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的倡导，知识分子从此在文学中失去了主角的位置，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也从此衰微。文学史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一个事实应当承认，出于知识分子对时代生活的认识和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倡导，确实有大批作家迅速转向描写劳苦民众。题材的转换，恰巧透露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一度寂寥。进入40年代后，在国统区，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再度繁荣，它不但在规模上对于“五四”文学有所超越，而且在作品中逐步增强了知识分子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倾向。曾文清（曹禺《北京人》）、汪文宣（巴金《寒夜》）、乔仁山（老舍《归去来兮》）、胡去恶（师陀《结婚》）、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田畴（沙汀《困兽记》）、白知时（李劫人《天魔舞》）、方鸿渐（钱钟书《围城》）等文学形象，都体现了这一倾向。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国统区的作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严酷和客观环境的险恶的描绘上，而是着力于从文化角度去考察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通过剖析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以及造成缺陷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进行批判。

即使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在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上仍没有出现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作品，它显然受到了多种原因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作家尚未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他们尚未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传统的文化心理再一次限制了知识者的眼界与目标。此种不足本来应当在赢得了和平的新时代得到弥补，但事实正好相反，人们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全面衰微。连知识分子能否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



之地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作家们还有余力去顾及自身性格的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不仅不允许知识分子对生活发表任何独到的见解（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甚至连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如宗璞的《红豆》）都遭到无情地摒弃，“知识分子特点”在文学中被多次清洗，历史上消极因素被推向极端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清算。

历史阶段难以超越。中国的现实在呼唤“五四”精神的回归。新时期文学正是这一历史深沉呼唤的一个回声。当时代的转机出现之后，知识分子率先发出了“人啊人”的呐喊，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也在呐喊声中走向兴盛，走向深刻。回顾新时期这一题材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力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肯定自身价值的阶段。简言之，也是知识分子重新从“鬼”成为人的阶段。此阶段有三部典型的代表作品：《天云山传奇》《灵与肉》和《人到中年》。三部作品尽管取向不同，但潜在的创作动因都是在谴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不公平待遇，在歌颂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却矢志不移、保持美德的同时，努力赢得社会各阶层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理解，以恢复知识分子的应有地位。应当说，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此阶段的文学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由面向社会到面向自身的阶段，是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批判的主体意识苏醒的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注重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追究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么此阶段作品的重心则渐渐偏向社会中的个人，它的思考指向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这无疑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一个深化。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陆文夫的《井》、谌容的《散淡的人》和《献上一束夜来香》、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蒋子龙的《蛇神》、俞天白的《X地带》、刘恒的《白涡》以及金岱的《侏儒》等一批作品都各自有所侧重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层面上做出了颇见深度的开掘。这些作品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精神现象：陷于传统的知识者的无尽忏悔、被传统文化心理所绞杀的生命、企图逸出传统规范的人生悲剧、以恶抗恶之后的自我反省、观念和行为相悖的痛苦、“人格分裂”的灵魂暴露……尽管作家们的思想认识不尽相同，对于自身的批判也很难说都具备了现代意义，但毕竟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今天，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进行批判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现代化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真正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伴随着现代化主体——人的群体行为重建的文化变迁，这就涉及我们民族文化性格重建和文化环境重建的问题。鲁迅先生早就把社会改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变革，二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三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革。他认为第三者是社



会变革的根本，立国必须先立人。

第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使我们获取了与原有自我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世界性的改革浪潮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第三，民主空气的形成和探索精神的增长。旧有的价值系统的崩溃和当代文化内在冲突的激烈，必然要求理论界对以往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民主空气和探索精神则为反思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条件。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不但拥有深刻的自身体验，积累了理论上的丰富经验，而且随着自身独立意识的逐步加强，使他们有可能继承“五四”精神，重新获得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

历史在飞速前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古老国度雍容而持重的步态，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民众的头脑，将勇敢地成为时代的先导。中华民族的性格能否重建，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成功地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对自身性格进行富有现代意义的自我批判，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批判意味着扬弃，意味着蝉蜕，意味着重新选择，意味着走出传统，获得新生。基于文学在我国人民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它通过电影、电视、教育、报刊、戏剧等多种途径影响着全社会），中国作家应当自觉地成为最先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在自我批判的同时，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道肩负起民族启蒙的历史重任。

注释：

[1]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7、33 页。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4] 巴金：《随想录·“紧箍咒”》，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5] 巴金：《随想录·再论说真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一个模式中的两个原型



——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当我选择这一论题时，实际上已经抱有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产生此种愿望的背景自然与文学从客体转向主体的逐步明朗化的发展趋势有关。而我之所以将当代文学作为透视对象，是因为我相信：在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拥有充裕的精神自由空间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科学诸多门类极不发达的状况下，唯有文学成为普遍压抑下的一个宣泄口，也唯有文学成为记录知识分子思想和精神现象的主要载体。所以，通过对当代文学多侧面多角度的多点透视，寻求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全面把握，肯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从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谈起

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并不会对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载《人民文学》1950年第一卷第三期）留有多少印象。重读旧作，难免感到平淡，它除了以丈夫的眼光来写妻子的言谈举止而葆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外，在艺术上并无独到之处。它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多半是依赖于由它所引起的一场建国初期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的影响力仅次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然而，一旦将这部作品置于历史的动态发展的链条之上，它便具备了远远超出作品自身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通过一对青年夫妇琐碎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他们在进城后一度发生矛盾又重新和好的故事。作者所表现的主题显而易见，无非是揭示进城之后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应当彼此取长补短的现实问题。如此作品，何以打破了文坛的平静？我认为，关键在于这对青年夫妇分别代表着两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丈夫李克是战争年代由城市流向农村的文化人，12年后又回到大城市的怀抱，平添了一种重返故乡的喜悦。妻子张同志则在“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乡村孕育了他们的爱情，使他们拥有着静谧而和谐的